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的理论 逻辑与现实解释^{*}

何召鹏 袁翰铮 肖 畅^{**}

【摘 要】针对我国以“内需不足”为突出表现的经济循环不畅的现实,本文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批判借鉴马克思主义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构建了一个分析当代中国经济循环的理论框架——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理论。其核心特征在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调控体系对资本增殖性的制度性约束与战略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循环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利用此框架分析分税制改革以来三阶段的中国经济实践,发现过分依赖“次级循环”、轻视“第三级循环”是内需不足的深层次原因。为此,本文提出“双重转型”的改革思路,一方面加大科技创新与以保障性住房为代表的民生建设投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另一方面协调推进相关制度改革,变革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约束机制,并适当保留地方政府开展基建投资、缓冲经济波动的能动作用。

【关键词】内需不足;资本“三级循环”理论;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理论;“双重转型”

^{*} 作者感谢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理论基础和制度设计研究”(项目批准号 24ZDA01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重大举措研究”(项目批准号 23AZD016)的支持。文责自负。

^{**} 何召鹏,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袁翰铮(通信作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E-mail: 1223947265@qq.com;肖畅,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引文格式: 何召鹏,袁翰铮,肖畅. 2025. 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的理论逻辑与现实解释[J]. 政治经济学季刊, 4(3): 19-49.

Cite this article: HE Z P, YUAN H Z, XIAO C. 2025.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Three-circui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national economy[J]. *Political Economy Quarterly*, 4(3): 19-49. (in Chinese)

2024 年 12 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主要是国内需求不足^①。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式下,这一问题反映了国内产品价值无法顺利实现,其本质是以实体经济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循环不畅。“如果经济循环过程中出现堵点、断点,循环就会受阻,在宏观上就会表现为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风险积累、国际收支失衡等情况,在微观上就会表现为产能过剩、企业效益下降、居民收入下降等问题。”(习近平,2025, pp. 396-397)因此,破除经济循环堵点意义重大。如何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是当前学界亟须探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

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深入探讨了“国民经济循环”问题,但仍存在理论盲点。一类聚焦于我国经济循环具体问题,在某一视角下,如全球价值链与国际分工(江小涓和孟丽君,2021)、流通标准一体化建设(刘海建和胡化广,2023)、区域市场分割(余泳泽等,2022)、宏观劳动收入份额(田野等,2024)、贸易成本(李自若等,2022)等进行数学模型建构,探讨畅通循环的可能路径;一类侧重于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从宏观角度来整体剖析中国经济循环,这些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谢富胜和匡晓璐,2022;韩雷等,2022;韩喜平和马丽娟,2024)、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理论(徐志向等,2021;王智强和程恩富,2024)等。现有研究深化了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认识,但仍存在如下不足:一是多从工资、利润、租金、利息等一般经济范畴探讨国民经济循环,而忽略了支配这些范畴运动的具体制度安排和社会生产关系;二是缺乏一个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循环的系统分析框架。

马克思的产业资本循环、扩大再生产理论是理解国民经济循环规律的基础,该模型基于 19 世纪 40 年代至 60 年代生产条件不发达、纺织业主导的英国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实践,为经济循环分析初步构建了基本范式。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新变化:物质基础设施、技术创新、公共服务支出大幅增加,形成独立产业部门的同时提高了资本积累效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强,产业资本的主导地位逐渐被金融资本取代,长期投资暂时消解了战后的过剩需求,但又引发了新的积累危机。据此,大卫·哈维等学者将物质基础设施和非物质生产条件纳入资本循环分析,构建了资本“三级循环”理论,研究了产业资本循环中相对过剩的流动资本,被金融系统和国家组织转移至长期投资领域的机制与原则,肯定了国家和金融系统在平衡资本循环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在平滑经济运行和大型基建方面,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为全面考察一国经济循环提供了一个更为完整的系统分析框架。该理论对

^① 新华社. 2024-12-12.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2/content_6992258.htm.

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针对我国当前以“内需不足”为核心的经济循环不畅的现实,本文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本原理,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理论指引,批判吸收资本“三级循环”的思想成果,构建了一个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循环框架——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理论。其核心特征在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调控体系对资本增殖性的制度性约束与民营资本的战略引导。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和资本“三级循环”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在不同历史实践背景下的创新发展。

余文安排如下:第一节阐述马克思资本循环、再生产理论和资本“三级循环”理论;第二节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构建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理论;第三节运用该理论框架解释分税制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实践,剖析“内需不足”的理论逻辑与历史成因,并提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解决思路;最后是研究结论。

一、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循环规律的高度概括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扩大再生产理论是理解国民经济循环规律的基础。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资本循环理论的创新发展,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循环规律的高度概括:首先,三级循环协同共进,“初级循环”是基础,同时需要“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来优化自身循环条件。其次,资本流入更高层级循环以利润率为导向,并依赖“初级循环”的过度积累,该做法虽能缓冲经济波动、加速价值生产实现,但处理不当会加剧过度积累问题,须有中介力量引导并保证资本的生产性使用。最后,金融系统和国家是调节中介,前者虽能平衡资本流动但有过度投机的系统局限性,后者能稳定经济运行但被特定资本集团所操控。

(一)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扩大再生产模型是理解国民经济循环规律的基础

在马克思的视域下,如果想考察一国的经济循环进程,不仅要探讨单个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还要考虑整个社会资本的再生产。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不同单个资本周转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先后用了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两个模型来刻画,后一个模型更符合现实国民经济循环的动态。19世纪40—60年代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自由竞争,资本集中度低,企业规模较小,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很少;(2)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不发达,公共服务投入

低;(3)纺织业主导资本主义生产^①。基于上述情况,马克思对该模型作出了如下假定:(1)考察的是纯粹资本主义经济,只有工人、产业资本家两个阶级,后者是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这意味着,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未发生分离,投资和生产活动合一,仅指产业资本;(2)社会总产品价值分为 c 、 v 、 m 三个部分,社会生产分为I、II两大部类,无对外贸易;(3)每年固定资本的耗费在当年可得到完全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完成回收;(4)无产品创新,仅将消费资料分为必需品和奢侈品,不涉及两大部类的产品迭代。在上述假定下,马克思构建了社会产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模型。

首先,社会产业资本为了不断实现再生产,需要在循环中不断变换资本形态并履行相应职能,最后回到出发点,不得中断,这和单个资本的运动相同。不同的是,社会资本的循环,不仅要考虑生产消费,还要考察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消费,既包含资本流通,又包含一般商品流通。其次,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关键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扩大再生产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是: $I(v+m) > II(c)$ 、 $II(c+m-m/x) > I(v+m/x)$,即两大部类都存在可追加投资的生产剩余;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是: $I(c+v+m) = I c + II c + I \Delta c + II \Delta c$ 、 $II(c+v+m) = I(v+m/x) + II(v+m/x) + I \Delta v + II \Delta v$,即上述生产剩余的耗费在两部类可分别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最后,受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的驱动与支配,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所要求的比例关系是通过不断的震荡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来强制实现的。“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个过程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1974,p.562)

(二) 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是马克思产业资本循环、再生产理论的创新发展

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在马克思的产业资本循环理论的基础之上,将物质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通信物流、住房)与非物质生产条件(如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研发创新)的投入与回收纳入资本循环分析,形成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即资本循环分为初级循环、第二级循环(也称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为全面考察一国资本循环运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资本主义发展出现了新变化:(1)战后需求饱和,

^① “在兰开夏郡,棉纺织工厂占据统治地位,它们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同类工厂占45.2%,占纱锭总数的83.3%,占蒸汽织机总数的81.4%,占棉纺织厂蒸汽劳动总数的72.6%,占雇佣职工总数的58.2%。”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2021,p.482)。

产能过剩,美国通过固定资本、住房投资(郊区化)、技术创新(半导体、电子计算机)、公共服务支出(福利国家)等方式消解过剩,支持了“黄金年代”的快速增长,但70年代的经济危机又让之前的长期投资面临贬值。“过剩”的支配规律亟待探讨和理论化。(2)30—60年代凯恩斯主义主导经济政策制定,政府加大对经济的干预力度,70年代的“滞胀”引发金融自由化,金融资本力量超过产业资本。(3)运输、通信等基础设施快速发展,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并形成了独立的产业部门,对制造业发展的提升作用明显。由此,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对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的前提假设作了扬弃:(1)考察的依旧是资本主义经济,但不只是有工人、产业资本家两个阶级,还涉及金融资本家、土地所有者、资产阶级政府等。该理论假定剩余价值在统治阶级之间分割、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发生分离、投资和生产活动相互较为独立,考虑了投机行为。(2)社会总产品依旧分为 c 、 v 、 m 三个部分,但社会生产不再只划分为两大部类,而是流动资本、物质基础设施、非物质生产条件三类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这来源于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3)包括固定资本在内的长期资本投入并不一定能顺利实现其价值,这些资本可能面临着“价值丧失”^①。(4)考虑技术进步,这体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再生产效率的提高、资本流通时间和费用的下降等方面,上述力量反映在物质基础设施和非物质生产条件之中。但技术进步仅限于生产与流通效率的提高,不考虑产品创新。

在上述假定下,哈维以资本价值回收周期的相对时长为划分标准(Harvey, 1978),将资本循环划分为三个层级,如图1所示。

首先是资本的“初级循环”——流动资本循环,该循环的理论基础源于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如图2所示。哈维沿袭马克思,作了劳动生产率不变的假定(Harvey, 1978)。这意味着,“初级循环”的生产消费只考虑劳动力、原材料等流动资本的追加投入,而作为硬件意义上的技术——固定资本,其更新过程暂不考虑。劳动力再生产只涉及一般消费品的消耗,消费基金(住房、汽车等消费工具)、软件意义上的知识(教育与管理组织)都暂不涉及。

哈维把“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的形成和使用中的资本流通过程的总体”(哈维, [1982]2017, p. 376)定义为资本的“次级循环”。这类资本投入回收周期明显长于流动资本。按照作用方式的不同,固定资本分为两类:一类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如机械设备和工具;另一类则在直接生产过程外,提高资本价值生产与实现的效率,如铁路、运河、通信设施。后者也被称为“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

^① “价值丧失”:丧失了社会意义的抽象劳动。参见哈维([1982]2017, p. 3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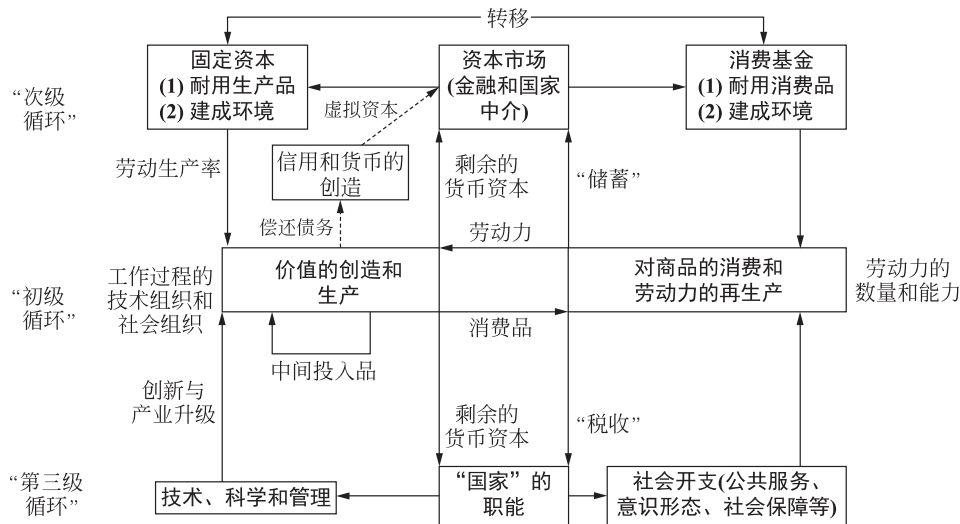


图1 资本“三级循环”模式图

资料来源:Harvey(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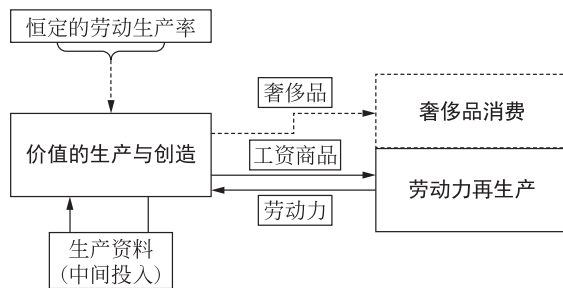


图2 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初级循环”)模式图

资料来源:Harvey(1978)

它们通常与所嵌入的土地共同发挥作用,会以物质基础设施的方式参与资本积累,成为生产的一般条件,其所有者通常并不是某个个别的生产者,而是国家。交通物流设施会加快商品资本的周转和可变资本的流动,而通信与网络设施会为货币资本的流动创造便利。资本通过提升运输效率,用更少的流通时间消灭了空间距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何召鹏,2025)。除了生产领域,某些商品在消费领域中发挥了类似于固定资本的作用,即消费基金。住房、汽车等消费工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劳动者消费,并且通过提高劳动力再生产的效率来强化资本积累的条件。第三级资本循环涉及两类资本的投入与回收:一类是与劳动力再生产相关的社会基础设施投资,包括技术层面(教育、医疗、社保等)和意识形态层面(思想、国家政权等);另一类是科学与研发支出。二者都服从资本

积累,前者将从技术和素质上为资本培养合格的劳动力,后者将为相对使用价值生产创造条件。然而各种非物质生产条件形成的“人力资源复合体”,由于前期投资量大、直接盈利性差、投入回收缓慢且收益易于扩散,无法完美地符合资本积累的时间与地点要求,这与“独立类型”的固定资本形成的情况类似。

(三) 资本“三级循环”的协同:以“初级循环”为根本的动态平衡

资本“三级循环”是一个有机整体,必须相互协调。在资本积累中,“三级循环”要以流动资本的循环为基础,“初级循环”也需要另两级循环为其优化循环条件。

“初级循环”是资本“三级循环”的基础。该循环考察的是流动资本的投入与回收问题。原材料作为不变资本,其价值通过活劳动一次性转移到商品资本中;劳动力作为可变资本,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次级循环”所涉及的固定资本,从供给层面看,因其通常形成于社会投资,通过债券、基金等方式获得利息,实际上是对未来活劳动的预期占有;从需求层面看,这类资本不只对单个资本家负责,而是对自身使用价值所能辐射到的所有企业发挥作用,这使得使用者通常会以各种方式租借获取。使“初级循环”与“次级循环”统一起来的,是固定资本“陆续回流”的价值周转方式:“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同的回流方式,表现为出租和出售的、年金利息和利润的、各种形式的租金与利润的区别”(哈维,[2023]2024,p.448)。无论是租金还是利息,都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这意味着资本的“次级循环”要以“初级循环”为基础,所投入的固定资本要尽可能地纳入生产性用途。在“第三级循环”中,社会基础设施投资用于优化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科学与研发支出用于破解资本积累的技术难题,两类支出最终也需通过剩余价值回收,故同样以“初级循环”为基础。

资本的“初级循环”也需要另外两级循环来优化其循环条件。各种物质基础设施会通过加强商品、货币与劳动力的机动性来消灭资本流动的物理障碍,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周转速度。“第三级循环”的投入,一方面会优化劳动力再生产条件,直接助力“初级循环”,同时还会通过助力“次级循环”来间接推动流动资本的流动:“在固定资本中,劳动力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固有属性,它既表现为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中的技巧”(哈维,[2023]2024,p.444)。这表明:创新与劳动力素质方面的投资,会通过形成相应的固定资本,优化工作过程中的技术组织与社会组织——生产方式来实现对“初级循环”的助力。

(四) 从“初级循环”到后两级循环:跨越循环层级的目的、条件和潜在危机

资本流入第二级与第三级循环需要具备两个重要因素:一是追求超额利润,激励资本机动性与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并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以抑制利润率的下降;二是“初级循环”中出现过度积累^①,即存在可以被转化为物质和非物质生产条件的剩余劳动力、生产能力和原材料。“初级循环”会出现生产相对过剩的问题,为了扫清资本价值实现的障碍,利润率下降导致的闲置生产能力、库存与待就业的劳动力可以被组织起来,用于物质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当流动资本的流动畅通之后,投资上述设施而积累的债务问题也将得到解决。在创新方面的投资会促进产业优化升级,从而在供给水平上为价值实现创造条件。

但在一些情形中,应对过度积累成为资本流入另两级循环的直接目的。由于后两级循环所涉资本投资量大且周转期长,这使得“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成为有效缓冲经济波动的途径,可以在固定资本较长的回收周期内暂时规避流动资本过剩问题。如果处理得当,解决过度积累问题的同时还会使另外两级循环畅通起来;如果投资项目并未带动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会加剧原有积累问题,流入另两级循环的资本也同样会面临“价值丧失”。

这表明,从需求层面讲,资本进入下一级循环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过度积累与生产过剩,但这一过程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矛盾,反而会酝酿新的危机;从供给层面讲,各种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由于前期投资量大,直接盈利性低,回收期长且收益易于扩散,单个资本家往往缺乏能力与动机去完成这类投资。因此,必须有相应中介力量的参与,代替这些资本家有效地引导与组织“初级循环”的过度积累流入另外两级循环,并保证其生产性使用来维持资本积累。

(五) 金融系统和国家调控:资本“三级循环”的平衡中介和现实困境

在资本“三级循环”中,执行“中介”功能的主体有两个:金融系统和国家。

生息资本“外在于又相对独立于生产”的特性,使得信用体系可以被用来平衡不同层级的资本流动。一方面,通过将货币转变为可贷资金,减少了退出流通的货币量,为进一步积累释放了更多货币资本。利用跨期支付,借助现代通信技术,生息资本克服了流通的时空障碍。另一方面,金融系统可以发行债券等虚拟资本,以“初级循环”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的预期为凭证,将货币化的闲置生产能力与商品聚集起来,引导其流入资本的第二级和第三级循环中。信用体系成为平衡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与非物质生产条件流动的必要中介。

^① “过度积累”:资本缺乏盈利性的投资途径而被迫堆积。参见哈维([2004]2019,p.82)。

但金融系统的调节以金融资本家的逐利属性为前提,无法克服私有制下的过度投机问题。生息资本“外在于又相对独立于生产”的特性,又恰恰成为金融中介的系统局限性:投入的资本不考虑背后的“初级循环”基础,只关注利息率的高低,土地投资本质上也来源于对未来剩余价值的预期。如果金融资本家对固定资本投资的收益预期不足,那么他们就不会投资,流动资本无法从“初级循环”到“次级循环”的结果是,相应的过度积累会演变为工人失业、工厂倒闭和经济危机,最终带来资本积累的停滞。因此,金融系统对资本循环流动而言,利弊并存。为了纠正这些“颠倒错乱的形式”,对于资本积累的稳固调节必须立足于国家调控。无论是产业资本还是金融资本,在使整个资本积累过程协调开展时都略显无力,国家凭借垄断的力量及其政策与调控工具,可以使资本流动变得更加系统与稳固,让过度积累的资本尽可能地纳入生产性使用。

“现代信用体系一般会展示出私人活动与国家信用的高度配合,国家机器的一个分支致力于直接或间接地管理金融中介。”(哈维,[1982]2017,p.440)利用金融系统,国家通过对各种分配的调节,影响着流动资本、固定资本与非物质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过程。在土地市场,对地租收益的分配和土地产权的规定会影响资本积累的区位与空间;在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对利息率的调控来影响企业的融资过程,进而协调产业结构。有时,国家还会刺激某些特定种类的信用流动,以支持特定地区与产业的发展。除此之外,国家可以利用税收与转移支付工具、发行债务的方式来为资本的第二级和第三级循环筹资,利用法律工具为整个积累的平衡提供制度保障。有了国家的介入,投机行为得到调控,后两级循环的开展也似乎会按照“初级循环”的要求来设计。

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国家,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其平衡力量立足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这决定了其调节政策内化了资本积累“生产”与“实现”的基本矛盾,会受到资产阶级利益集团的制约,无法从根本上实现经济循环的平衡。例如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过剩的货币和过度积累的流动资本并没有被引导流入固定资本和消费基金领域以缓解经济波动^①,而是被注入金融系统,保障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原因是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离岸外包和金融化两个政策让美国国内“初级循环”的根基被侵蚀,“次级循环”的预期收益大大降低。在这样的“中介协调”下,美国的失业率于2010年1月跃至10.6%,GDP增长率于2009年来到-2.58%^②。

① 美国私人国内总投资(固定投资,住宅)于2005年开始下降,一直持续到2011年左右;私人国内总投资(固定资本,非住宅)于2008年开始下降。这两项投资在危机之前都呈不断上升态势。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

② 其中制造业部门失业率13.00%,金融部门失业率6.6%。数据来源于CEIC数据库。

二、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理论

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是对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实践的理论总结,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该理论虽对我国国民经济循环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但社会制度差异的存在使得我们不可直接套用。我们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对过去的理论内核进行扬弃,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本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借鉴资本“三级循环”的一些理论成果,构建了一个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中国经济循环的理论框架——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其核心特征在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调控体系对资本增殖性的制度性约束与战略引导,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改变了资本的属性及其运动规律(郝戈,2023)。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循环的内在矛盾性,我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借助土地公有制、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体系三大制度工具,配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治理,构建起能统筹个体与公共、短期与长远利益的经济循环模式。这一模式既保持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性(有效市场),又通过国家战略引导(有为政府)克服了资本积累的矛盾与不足,但实践中仍面临央地博弈、发展错位等非对抗性治理难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循环的效率。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是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理论的基石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要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市场经济两个方面来把握。

第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存在某些类似于资本“三级循环”特征的内在原因。

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国于 1992 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几十年来,我国对内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对外深入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参与中心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进程。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利用剩余产品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条件,必须同剩余价值的占有和积累联系起来。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必然要关注利润率的动态,要以价值增殖为手段来进行使用价值的生产,否则无法在市场经济中立足。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着资本积累的现象和结果,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具有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所描述的某些一般特征。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离不开市场经济,但又不能只依靠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循环规律的把握,必须立足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

有制这一根本制度基础。

第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通过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来改变资本的属性及其运动规律,使我国的经济循环超越了资本循环。

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剩余价值的公共属性,这是资本运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呈现出特殊规律的经济基础。利用国有企业、国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开展生产,体现了劳动者为社会创造剩余的经济关系,生产剩余归全民所有并呈现出国有资本形态。国有资本体现着增殖收益的公共性、运动过程的计划性和风险承担的社会性,其来源通常是国企利润、土地租金和国家税收,这些剩余的资本化过程嵌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治理方式:既要服从于国家战略,流入私人资本不愿投资的次级、第三级循环之中,又要保值增值,助力初级循环。作为国有资本循环的载体,国有企业的活动体现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至于民营资本,其运动虽是以价值增值为基本目标,但同样服从于国家基于共同富裕、区域协调、产业平衡的总体规划。国有资本对于民营资本在战略产业上的吸引、协调和整合,房地产业、金融业、医疗教育事业上无序扩张的规范和约束,使得民营资本的私人增殖目标嵌套在整个国民经济循环中,更好地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何召鹏,2022)。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保障了我国的资本积累服从于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主体体现,是生产剩余资本化过程嵌入社会主义性质的政治保证。在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下,资本“三级循环”理论的三大内核被批判性重构。第一,资本从初级循环向次级、第三级循环的驱动因素将不仅仅是单一的抑制“利润率下降”的因素。满足特定空间的物质基础设施与非物质生产条件的需要成为资本跨层级流动的另一核心主动性因素,这使得资本循环在我国变成了“使用价值优先”的经济循环逻辑。例如,我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偏远地区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投入等项目可能没有较高的显化利润率,但可以给当地人民带来便利,推动当地经济繁荣,缩小地区差异。截至2024年底,我国已实现100%的乡镇、90%以上的行政村通5G,农村5G网络平均速率达183Mbps。我国远程医疗服务网络已经覆盖所有市县,中小学校(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100%^①。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取得迅猛发展,水、路、电、讯等生产生活服务设施基本实现城乡全面覆盖。第二,过度积累的化解机制将被重塑。面对过度积累问题,解决机制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以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4-12-09. https://wap.miit.gov.cn/xwfb/mtbd/wzbd/art/2024/art_c201630dc5c44ab8adbb2631d4f8e4d4.html.

规模的失业等价值丧失为特点的“强制性调整”,转变为社会主义条件下,主动将过剩产能引导到基建等大型长期投资领域的方式。在平滑经济运行的同时,提高了长期生产力。第三,国家在资本循环中的属性发生变化。资本“三级循环”下的资产阶级政府是特定资本利益的代理人,其经济政策囿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代表的是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

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驾驭着资本(郝戈,2023),削弱了其对抗和异化形式,使其逐利的直接目的服务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根本目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协同治理下,在土地公有、重要金融系统公有、影响国计民生战略部门公有等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下,我国的经济循环实现了个体与公共利益、短期与长远利益的统一,克服了资本积累规律的局限性。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不同层级资本循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理性所把握、从而受到这种理性支配的规律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控制”(马克思和恩格斯,2012,p. 510)。本文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中国经济循环模式称为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该模式和资本循环相比,特色之处在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对私人资本增殖性的制度性约束与社会资本的战略引导,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改变了资本及其运动的性质。具体来说,公有土地制度、国有企业、国有金融系统是平衡资本流动的重要工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执行调控的中介主体,个体与公共利益、短期与长远利益的统一是相较于“资本”的“国民经济”内涵。

(二) 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的调节工具

不同层级经济循环间的转化,并不一定是顺畅、自然的,不同种类资本的流动也不会总是平衡的。为了克服资本积累规律的局限性,主动的协调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我国经济循环中,土地制度、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系统是执行调节的重要工具。

1. 土地公有制是平衡经济循环的“坚实根基”

我国坚持“城市土地全民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土地公有制。土地作为产业开展的载体,自身可以以两种形态参与到经济循环进程:使用价值形态与价值形态。前者涉及土地的规划、出让、征收、储备等方式,这决定了资本积累开展的空间与盈利状况;后者涉及土地出让金、税收、抵押融资等增值收益的支配与使用,这有助于调动资本积累主体的积极性或推动重大建设项目的落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土地公有制是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土地得以平衡不同层级资本循环的经济基础,这决定了价值与实物形态的土地供给的公共

利益性。同时,土地调控相较于其他调控手段,不仅可用于反周期调节,更可应用于经济增长长期规划,兼具总量与结构调节的优点。

在“初级循环”中,政府通过土地调控控制着流动资本的积累节奏。当需要提振经济时,土地生产要素可以被低价供给以吸引制造业投资,发展新兴产业。当经济过热时,可以通过限制工业用地供给来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过度积累,减少落后、无效产能供给。在“次级循环”中,土地出让金与土地抵押融资为城市化提供了资金来源。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的地方政府既是基础设施的投资者,又是土地增值的受益者,两个角色的重合使得地方政府会主动引导“初级循环”的过剩资本流入“次级循环”,有效地平滑经济运行。对于“第三级循环”,土地资源一方面可以被划拨专门用于教育、医疗、保障住房等公共服务的开展,另一方面其增值收益可以被用来投向社会非物质生产条件之中,为“初级循环”优化劳动力再生产的条件。在土地公有制下,土地分别以价值形态和使用价值形态参与资本积累,对产业规模、产业组织、产业结构、产业空间布局进行规制和影响(杨雪锋和史晋川,2010),有力地促进了不同层级资本循环的协调与平衡。

2. 国有企业是平衡经济循环的“战略稳定器”

在国有企业中,一方面生产资料归全体人民共同所有,这决定了其经济剩余除了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其他部分要以利税的方式上缴国家,呈现为公共财政收入等形式,用于助力社会层面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建立在分工之上,这使得劳动者不能单纯地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与国企业生产资料发生联系,而必须以“就业”的方式(林岗,1987),通过劳动和生产资料结合。同时作为企业,国有企业还必须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任。国有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国企所生产产品的“局部商品性”和“直接社会性”(张宇,2016),进而决定了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双重身份:既是资本积累的重要载体,受利润驱动,又是国家战略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承担着各种非经济使命,是资本循环的稳定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习近平,2025,p. 195)。具有双重属性的国有企业超越了哈维在“资本一般”前提下的经济循环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突破了单一企业的能力边界,能够快速整合资源,促进不同层级经济循环的协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有企业要做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排头兵、做创新驱动发展的排头兵、做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的排头兵”^①。在“初级循环”领域,国有企业是基础产业的“压舱石”,保障了战略产品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避免了过度竞争带来的相对过剩。在主导战略领域的同时,形成了对其他产业开展活动的

^① 求是网. 2022-07-11. 突破难题、攀登高峰,国有企业要做“排头兵”. http://www.qstheory.cn/zhuangu/2022-07/11/c_1128820356.htm。

“托底”作用。在“次级循环”领域,国有企业一方面承担了长期性、高风险的基建投资项目,弥补了私人资本缺乏能力与动机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可以借助国有金融体系,吸收社会货币化的过剩资本,支配土地资本化后的增值收益,引导其流入生产性用途,实现逆周期调节。在“第三级循环”领域,国有企业一方面是社会公共服务的“兜底者”,承担了保障性住房建设、医疗资源下沉、偏远地区社会支出等工作任务;另一方面会组织专家团队对重大技术难题进行科研攻关,服务产业发展的需要。

3. 国有金融体系是平衡经济循环的“总阀门”和“风险防火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有金融体系(国有银行、政策性银行等),由金融调控、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服务和金融基础设施六个子体系构成。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确保了金融工作的立场与方向。在实践中,国有金融体系和国有企业、土地公有制相互协调配合,共同作为调控工具平衡了宏观经济三级循环。

公有制主导的金融体系是调节资本跨层级循环的“总阀门”。相比于纯粹自由化的“盎格鲁—撒克逊”金融模式,我国的国有金融体系在承担为不同层级经济循环提供资金融通、市场定价、资源配置与信息供给等职能之外,还有效地阻隔了金融市场的“羊群效应”和“传染效应”,从而最大限度地解决了金融监管始终滞后于金融创新带来的现实或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难题(王晋斌和厉妍彤,2021),成为系统性经济危机的“风险防火墙”。同时,主导性的国有金融体系,是党和政府推行国家发展战略、国有企业跨地区调动资源实行逆周期宏观政策、兴建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支配土地增值收益的力量基础。由于资本的匹配问题,“初级循环”的过度积累并不能直接流入“次级循环”^①。对此,政府可以通过预估流动资本过剩的大致规模,借助国有金融体系来发行专项债务,将过剩的原材料与待就业的劳动力“货币化”,转变为可以流入物质基础设施和非物质生产条件的资本形式,弥补了私人发行虚拟资本信用不足的问题。引导闲置资源流入未来的生产性使用途径,有效缓冲经济波动的同时,还提升了整个经济的循环效率。

(三) 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协调平衡的中介主体与运行机制

“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习近平,2025,p.78)上述平衡工具的正确、科学使用,有赖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两个中介主体的协调作用。代使国有企业、城市土地等全民所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得以调节三级

^① 哈维举了一个皮鞋和铁路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不匹配:卖不出去的皮鞋无法直接投入到铁路的生产,需要先将这种过剩“货币化”,而后才能引导资本流入“次级循环”。参见哈维([1982]2017,p.419)。

经济循环节奏的力量基础,这意味着它们可以在社会范围内利用国有金融体系支配国企剩余和土地增值收益,主导剩余的资本化过程。

中央政府负责顶层设计,全局统筹我国经济循环的节奏与方向。首先是政策与战略引导,借助税收减免、产业补贴、定向贷款等财税与货币政策,“五年规划”“区域协调”等战略规划,引导资本流入特定的资本循环层级,实现第二级、第三级循环的跨地域配置。其次是风险管控与再分配,通过金融监管来抑制利息和地租的过度提取,进而规制房地产的过度投机;借助转移支付体系,引导资金流入偏远、欠发达地区的“第三级循环”中,利用国有企业保障当地“初级循环”的劳动力再生产环节。最后是国际资本循环协调,借助“一带一路”等政策,在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还可以将国内的过度积累纳入国际范围内的生产性使用路径,缓解国内经济下行压力。

地方政府在特定的增长目标下,灵活执行中央政策,实行差异化的区域经济循环实践。首先,地方政府是中央政策的执行者,结合本地资源禀赋条件,地方对国民经济循环整体规划开展适应性调整,如“招商引资”“土地财政”“土地金融”等行为模式。其次,地方政府是区域经济循环的主导者,承担着为产业发展吸引投资推动工业化、为城市建设兴修基础设施推动城市化、为属地劳动力再生产提供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等使命。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循环领域的实践将决定国家宏观经济循环的表现。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治理下,我国借助公有土地、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体系等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构筑起能统筹个体与公共、短期与长远利益的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运行模式,如图 3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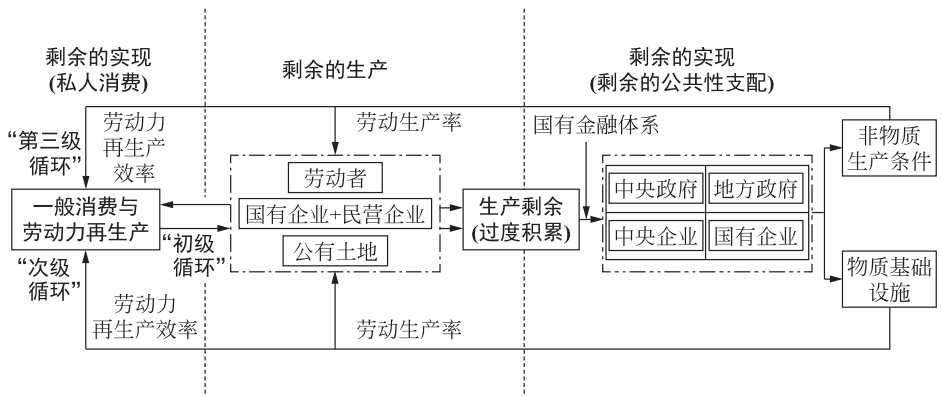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模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初级循环”一端,劳动者可以在国有企业或民营企业中创造剩余,这些企业之下的土地具有公有性质;另一端是价值的实现,方式是个人消费和企业投资。民营企业的经营会带来生产剩余,一类归企业所有,以利润、工资等形式体现;另一类归国家所有,以增值税、土地税等税收、土地出让金等地租形式体现,土地税和土地出让金是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国有企业创造的剩余具有公共性质。

但私人性的生产剩余会出现过度积累的问题,如果情况普遍,在宏观上会造成经济下行压力。当价值无法通过个人消费直接实现,一个有效的路径是把无法实现的价值集中起来进行公共性支配,创造促使他们实现的条件,让这些价值未来可以被个人消费实现或暂时由公共部门投资实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调组织下,上述公共性的生产剩余通过国有金融体系被组织起来,借助各种国有企业、行政企事业单位流入第二级和第三级循环之中,形成物质基础设施和非物质生产条件,通过提升“初级循环”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再生产效率让过剩产能重新纳入增值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级循环除了从生产率方面促进资本积累,还可能通过创新生产方式带来产品的创新,这一层面被马克思和哈维的模型忽视了。新产品不仅会带来新的“初级循环”动力,还会带动额外的“次级循环”和“第三级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是发挥了产品创新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私人的过度积累还可以被直接组织起来。政府对流动资本过剩的规模进行大致预估,借助国有金融体系发行专项债务,将过剩的流动资本“货币化”,并借助国有企业使这些剩余流入另两级循环之中,从而直接消解过度积累。这样,资本便成功实现了在不同层级间的顺畅转换。

同时,除了党的领导和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性约束外,“财政分权”和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绩效考核制度为地方政府引导资本流入“次级循环”提供了内生性激励,这也导致他们对收益易扩散、不易以增长指标度量的非物质生产条件的形成缺乏主动。价值的公共性实现要向有利于畅通“初级循环”的方向进行。我国的制度安排已经确保了过度积累价值实现的“公共性”,但能否保证其实现的“生产性”,需要中央政府对主导区域经济循环开展的地方政府进行系统规划与引导。

综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既有不同层级经济循环的顺利开展,体现“有效市场”,又有个体与公共、短期与长远利益的协调,彰显“有为政府”。三类调节工具连同各级政府主体,共同组成了平衡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的“中介力量”。然而在实践中,受财税、土地、官员绩效考核等制度的影响,中央总体的战略规划和地方局部的经济增长存在张力,这使得各级政府在协同的同时,还

存在博弈。央地关系的动态平衡,将深刻影响国民经济循环的开展方式和效果。“中介力量”在克服资本积累规律对抗性矛盾的同时,也带来了局部与整体发展错位的非对抗性难题,并呈现出如市场分割、公共事业缺失、投资过度等具体样态,威胁我国经济循环的畅通。对于“内需不足”循环不畅问题的分析,本文将在下节借助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理论,结合中国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经济实际展开探讨。

三、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理论的现实解释

以分税制改革为界,本节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经济循环按照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不同大致分为三个时期。第一阶段,1994—2008 年的“招商引资+土地财政”时期:“初级循环”产品价值依靠外需及其牵动的内需共同实现,动力强劲;“次级循环”开展主动,但基本围绕“初级循环”运行;“第三级循环”开展动力不足;强劲的外需掩盖了内需的缺乏,循环总体状态良好。第二阶段,2009—2015 年的“基建扩张+土地金融”时期:外需受阻、内需不振引致“初级循环”阻塞;地方政府延续“以地谋发展”,“次级循环”脱离“初级循环”;“第三级循环”动力依旧不足。第三阶段,2016 年至今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①:上阶段内需不足及其引致的问题加速显现,须通过“双重转型”改善经济循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阶段性、长期性、结构性视角对待内需问题,为“双重转型”提供了实践思路。我们认为,当前突出的内需问题多源于“第三级循环”投入不足。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双重转型”方案:(1)加大“第三级循环”投入,释放内需,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2)深化财税、土地、户籍、官员绩效考核制度改革,打通“第三级循环”制度堵点,促进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转型;(3)适当保留地方政府在开展“次级循环”中的能动作用。

(一) 1994—2008:“招商引资+土地财政”时期

1994 年分税制改革鼓励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行为模式,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这些企业在 2008 年以前有相当大的比重依赖出口^②。面对激烈的全球

^① 之所以将中国经济循环第三阶段(2016 年至今)划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原因是:内需不足对经济发展的制约,虽然基本上是从高速增长阶段结束之后(2010 年左右)就开始的,但以结构性、长期性、阶段性视角对待内需问题(郭克莎,2024),以供给结构优化来解决内需问题却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提出的,特别是 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才开始全面贯彻落实。其中有两方面的供给需要得到重点优化:一是一般产品供给质量提升,以匹配个性多样化消费需求,这需要创新;二是公共服务供给增加,以降低居民消费不确定性。两方面问题解决的关键是要重视“非物质生产条件”在我国经济循环中的重要作用。这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后我国经济循环相比于前两阶段呈现不同样态的关键因素。

^② 根据李健伟(2018)的测算,2007 年,出口占我国最终消费与基础需求的比率分别为 68.68%和 40.72%。

引资竞争,地方政府会采取包括低价提供工业用地、基础设施配套在内的优惠政策组合来提升成功率。“土地财政”为产业补贴与城市建设提供了解决资金问题的渠道。用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本中,土地出让收入占据十分重要的部分^①。土地出让金所依赖的土地,并不是工业用地,而是商住用地。地方政府凭借着对商住用地的供应,一方面控制着住宅等建设用地的供给数量,另一方面修建基础设施塑造良好的区位,之后通过“招拍挂”的方式将使用权转让给房地产商,获得土地出让收入以支持后续城市建设与工业用地补贴。

因此,在这一阶段,地方政府通过低价出让工业用地、配套基础设施以吸引外资进驻,制造业企业在当地成长起来会带动经济和人口集聚。产业的发展会带来物质与社会基础设施的投资需要,同时又会带动更多的工业用地需求,这助推了工业园和开发区的兴建;工资提高会吸引更多人口流入,进而增加对商住用地的需求,这不仅带来了房地产与建筑业的发展,还会进一步抬升地价。最后通过高价出让商住用地,获得土地出让金,为下一阶段的循环奠定基础。可以用图 4 来描绘“招商引资+土地财政”时期的中国经济循环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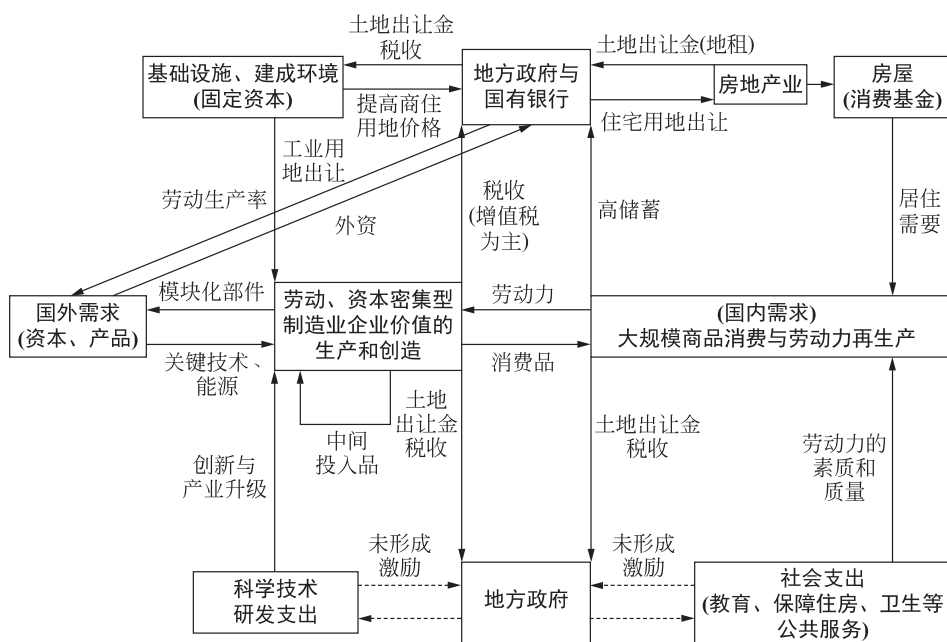


图 4 1994—2008“招商引资+土地财政”时期中国经济循环模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根据张平和刘霞辉(2011)的测算,2007—2009年,全国城建资金中土地出让金分别占比35.04%、37.49%和39.18%。

第一,我国“初级循环”的资本价值通过内需与外需共同实现,呈现“外需牵引内需、下游带动上游、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蒋震,2014)的循环样态。制造业依托国内劳动力、原料与国外技术能源生产,消费品既满足国内需求,又通过加工产品出口服务外需。外需带动下游制造业的兴旺,助推上游重化工业利润增长,引致经济人口集聚,拉动基建与房地产投资,这些内需的扩张均源于出口的兴旺。地方政府的主要财力来源土地出让金,本质上是土地性质用途转变产生的级差地租。该地租具有非生产性的来源(孟捷和吴丰华,2020),是“初级循环”创造价值的转化形式,地租的获取受制于“初级循环”的畅通状况。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投资通过提升“初级循环”效率推高城市地租,若循环受阻,土地出让获租模式则难以持续。

第二,地方政府对“次级循环”的开展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但总体上按照“初级循环”的要求进行。该主动性源于我国相应的制度安排。从动机层面出发,财税与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为该行为提供了激励,投资基建与房地产能够拉动更多的经济增长、就业吸收等“政绩”,还能提高地价。从条件层面来看,我国的土地制度安排使得地方可以通过为城市供应土地获取一定的收益。在上述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既是基建与固定资本的投资者,又是土地所有者,两个角色的重合是我国资本流入“次级循环”呈现主动性的根本原因。但是,整体而言,该层级循环围绕“初级循环”开展,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基本上是通过提高资本机动性、提升劳动力再生产条件、凭借反哺“初级循环”来实现自身的投入与回收的。

第三,“第三级循环”开展动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缺乏激励,对“初级循环”的促进作用有限,经济的第二级与第三级循环失衡。一般而言,在有限的任期内,地方政府倾向于投资那些更能够带来“政绩”的重化工业、基础设施与房地产等领域,偏向于引导资本流入“次级循环”,而对于非物质生产条件的支出缺乏动机。这是因为公共服务与科研投入缺乏明显的利润信号,收益易扩散且难以以实物形态体现,无法在短期内给辖区内的地方政府带来财政收入与经济增长。后两级循环的失衡,会影响劳动力再生产的质量和数量,进而影响到流动资本的循环,最终传导到整个循环系统。只是此时强劲的外需掩盖了因非物质生产条件不足带来的内需问题,但在金融危机之后,内需不足成为主要矛盾。

(二) 2009—2015:“基建扩张+土地金融”时期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我国外需迅速萎缩^①，“初级循环”出现各种堵点(谢富胜和匡晓璐,2022),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为了应对危机,中央政府出台了进一步扩大内需、稳定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②。同时为保证符合条件

^① 2007—2011,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我国GDP的贡献率分别为7.8%、2.7%、-42.8%、-10.8%、-6.8%,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08-11-10. https://www.gov.cn/jrzq/2008-11/10/content_1143810.htm。

的中央投资项目所需配套贷款落实到位,次年,中国人民银行与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又宣布“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组建投融资平台”^①。出口产品价值的无法实现导致“招商引资+土地财政”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在经济现实和强劲的刺激政策下,转而被“基建扩张+土地金融”模式所替代。

在此期间,地方政府一方面通过成立融资平台,注入土地来撬动巨额的抵押贷款,放大土地的资本化程度;另一方面发行地方债来向社会筹集城建资本。两类融资模式都以土地出让收入为偿还基础。为了获得更大规模的土地融资,地方政府一边限制商住用地供给,一边引导资本流入“次级循环”,形成大量的物质基础设施,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房价和地价的上涨。大规模的基建扩张吸收了“初级循环”中过度积累的流动资本与货币资本,使我们较为平稳地度过了经济危机。然而,这一模式在平滑经济运行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发展问题,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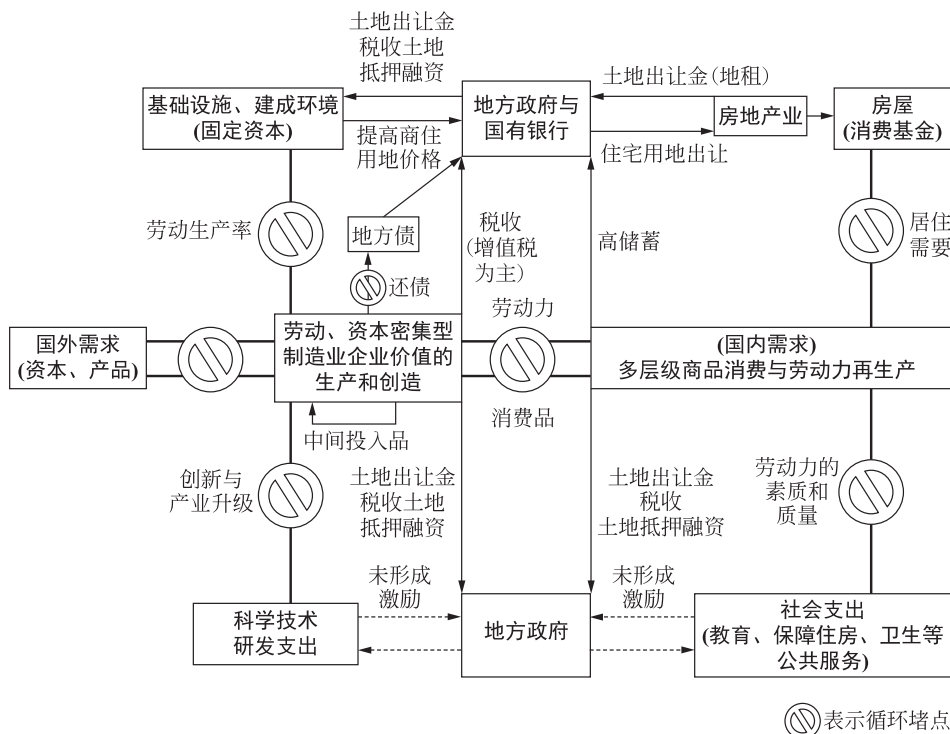


图 5 2009—2015“基建扩张+土地金融”时期中国经济循环模式图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① 中国人民银行. 2009-03-23. <http://www.pbc.gov.cn/goutongjiaoliu/113456/113469/2879576/index.html>.

第一,外需收缩,内需不振,“初级循环”受阻。从外部需求看,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下游制造业出口产品价值无法顺利实现,引致上游钢铁、水泥等重化工业产能过剩。从内部需求看,其一,以要素密集型、大规模生产为特点的生产方式已渐渐无法满足城镇居民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谢富胜等,2019);其二,基建扩张在一定程度上推高了房价,房贷在居民支出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再加上公共服务“托底”的作用不到位,导致居民的生活消费不足;其三,劳动力成本与土地成本价格不断攀升,低成本要素红利逐渐消失。“初级循环”的商品资本既无法通过外需得到实现,又无法通过内需得到实现,引致“初级循环”受阻。这一是导致无法通过经济集聚形成对物质基础设施的有效需求,使得“次级循环”受阻;二是价值的生产与实现出现困难,土地出让收入与土地抵押融资的价值源泉遭到破坏,经济“脱实向虚”。

第二,过度依赖“土地金融”,导致“次级循环”脱离“初级循环”,抑制了经济的良性循环。土地抵押融资和地方债券本质上是生息资本,必须以价值的创造与实现为源泉。然而,大多数地方政府却试图通过避开“初级循环”,直接引导资本流入“次级循环”来抬升商住用地价格,出现了“先建设城市,后发展产业”(王媛,2013)的经济现象。失去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资本的支持,固定资本与消费基金的形成无法带来有效的经济集聚,这会招致土地出让收入的下降,并最终形成地方债务风险^①。原本为了缓冲过度积累的基建扩张,最终因为利用率不高,被迫闲置与弃用,带来了更严重的过度积累。究其原因,前两级循环之所以会出现失调,本质上源于地方政府对上一阶段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这是在2008年之后开启大规模以次级循环为特征积累的制度诱因。在有限的任期内,地方官员仍会按照地区生产总值与土地出让收入最大化的方式开展区域经济循环。刺激政策带来的流动性,也大多流向了基建与房地产领域。对房地产的过分投机,会压缩“初级循环”的利润空间,这会反过来抑制地租与利息的提取,使土地出让收入与抵押融资的回报率越来越低。

第三,“第三级循环”投入依旧不足,难以有效带动“初级循环”。内需不足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居民消费有后顾之忧,公共服务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消费信心与能力不足,比如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过高和保障性住房供给不足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居民消费。2008年底,我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十大措施中,第一项就是“加快保障安居工程建设”^②,2011年,保障性住房的占比还比较低,不到

^① 根据周世愚(2021),2009年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增速达到61.92%的历史新高。其中,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同比增长70.4%。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08-11-10. https://www.gov.cn/jrzq/2008-11/10/content_1143810.htm.

当年城镇住房的 7%，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已达 25%~40%，甚至更高。“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五年这一比重将提高到 20%左右”（李克强，2011）。然而，据第七次人口普查和住建部的数据测算，截至 2022 年底，我国保障性住房的供应量仅占全国住房总量的 5%左右^①。二是产品供给质量与需求结构不匹配，消费动机与意愿不足。在宏观层面上，我国的教育、研发投入相较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②。投入不足的结果是无法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持，企业生产方式转变困难，实体经济利润率不断下降（谢富胜等，2019）。以上提到的有关内需不足的两大原因，归根到底是“第三级循环”投入不足，无法对“初级循环”起到明显的提振带动作用。

（三）2016 年至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

“新常态”以来内需不足及其引致的问题逐渐暴露，须“双重转型”转变发展思路。2014 年前后，受外需受阻、内需不振、土地的发动机功能逐渐减弱的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开始进入“新常态”。“基建扩张+土地金融”模式在受阻的“初级循环”下引发了资源配置低效、地方债务风险凸显等问题，我国迫切需要通过“双重转型”来畅通以“初级循环”为核心的国民经济循环。一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要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升级，增强经济循环质量与韧性，使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二是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转型，要降低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寻找可持续增收来源。后一转型是前一转型的制度基础，前一转型为后一转型提供方向指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结构性、长期性、阶段性视角对待内需问题，为“双重转型”提供了实践方向。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③。2016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重大结构性失衡，导致经济循环不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④。这标志着我们意识到，应对内需问题要从结构性、长期性和阶段性入手，重视优质供给尤其是非物质生产条件投入对提振内需、畅通

① 华安证券. 2024-01-17. 2024 年我国保障性住房专题报告. <https://m.vzkoo.com/read/20240117dcb08a9e5bb9edaa58e778da.html>.

② 根据 CEIC 数据库，2016 年中国、英国、美国、德国四国政府教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为 4.2%、5.2%、4.7%、4.6%，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分别为 2.1%、2.3%、2.8%、2.9%。

③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 2015-11-10. 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1/10/c_1117099915.htm.

④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作重要讲话. 2016-12-16. https://www.gov.cn/xinwen/2016-12/16/content_5149018.htm.

循环的重要作用。

“双重转型”取得阶段性成就,但内需问题仍十分突出,根源在于“第三级循环”产品有效供给不足。2013—2023年,我国最终消费率均保持在50%以上,居民消费支出占最终消费支出比重稳定在70%左右,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年平均值为53.9%,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①。土地出让收入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由2011年的59.95%下降到2023年的33%^②。然而经济结构与增长动力的转换并非一蹴而就,以“初级循环”为核心的实体经济循环的畅通仍面临挑战。公共服务层面,以保障性住房为代表的公共服务投入不足,存在政策堵点,居民被迫牺牲消费来偿还债务,消费能力不足^③;众多社保项目统筹层级不高,整体支出占比有待进一步提升,政策与管理的属地色彩较重。创新研发层面,产业转型升级存在瓶颈卡点,产业体系“大而不强”、关键技术“卡脖子”、产业升级所依赖的高层次人才紧缺、产业体系与科技创新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仍然存在。上述问题归根到底是“第三级循环”投入不足,存在政策堵点,居民消费能力、信心与意愿缺乏,导致内需不足,使得流动资本价值难以顺利实现,“初级循环”效能偏低,国民经济循环动力减弱。对此,要在理论中寻找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可行路径,在实践中深化制度改革,为“双重转型”奠定坚实基础。

(四) 未来国民经济循环的“双重转型”

针对以“内需不足”为核心的经济循环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双重转型”方案。

首先,加强“第三级循环”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须系统规划,以过剩产能与资源为支撑,加大教育创新与公共服务投入: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人才支持推动产业升级,提升供给质量,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另一方面扩大保障性住房等投入,消除居民消费顾虑,提高消费能力。应供需并举畅通“初级循环”,带动居民收入与企业利润增长,进而带动有效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畅通“次级循环”。前两级循环的推进将催生劳动力再生产需求,倒逼提高科研投入,提升“第三级循环”效率,构建高韧性、强动力的新式国民经济循环。例如,低空经济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4-09-14.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9/content_6974986.htm#。

^②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作者计算而成。2013年开始,土地出让收入算在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地方财政收入指的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③ 根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2024),截至2022年,个人住房贷款占个人消费贷款近70%,住户贷款余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15年的66.76%上升到2021年的104.3%。受这些因素影响,2023年居民部门杠杆率升至63.5%,较2022年上升1.3个百分点。

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之一,其发展依赖“第三级循环”带来的产品创新。该产业的中上游属“初级循环”领域,重点是航空器及相关的软件、原材料、芯片制造(赵景龙,2025)。当无人机和航空器技术成熟之后,低空经济也从初级的农业、消防和摄影业务转向高阶的物流业和旅游业,这会带动空域网络、起降场地、各类平台等基础设施的需求,“次级循环”也可得到畅通。再如,有研究表明,农业转移人口租住公租房可使非住房消费增加 22.8%(温兴祥,2025),这印证了公共服务对消费的促进作用。

其次,协调推进多领域改革,扫清“第三级循环”的制度堵点,转变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非物质生产条件不同于物质基础设施,没有可感知的实物形态,公益性较强,因此不能沿用“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传统办法。这一现实要求探索新型融资模式、创新制度安排,为普惠性扩张的非物质生产条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何召鹏和肖畅,2025)。财税制度上,明确政府支出责任,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汲取能力,降低土地依赖,加大以保障性住房为代表的公共服务、社保及创新人才支持,按企业生命周期精准补贴新兴产业。土地改革坚持“三权分置”,规范征地程序,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让土地增值收益更多地反哺乡村。户籍改革有序推进农民工市民化,发展县域经济,完善公共服务保障。官员评价体系考核上,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应纳入指标,强化地方合作,避免无序竞争,为“第三级循环”畅通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坚持辩证思维,协调“双重转型”,适当保留地方政府在开展“次级循环”中的能动作用。要协调好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关系,既重视“第三级循环”的长期效益,也不否认以往模式在短期平滑经济、完善基建中的贡献。“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习近平,2025,p.459),统筹短期刺激与长期变革,批判吸收上一阶段制度安排的优缺点,避免全面否定,以问题为导向推进改革。

四、结论

首先,本文系统地梳理了资本“三级循环”理论,该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的创新发展。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扩展探讨了如下内容:资本“三级循环”与马克思资本循环、再生产理论前提假设的异同,指出这源于当时的实践背景差异;三级循环间的辩证关系,指出资本“三级循环”是以“初级循环”为核心的动态平衡;资本流入更高层级循环的条件,即利润率导向与过度积累;资本“三级循环”的内在局限,即以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根源的循环失调。这些内容阐明了资本“三级循环”的理论逻辑和应用原则。

随后,本文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批判借鉴马克思主义资本“三级循环”理论,构建中国特色国民经济“三级循环”分析框架。中国通过土地公有制、国有企业和国有金融体系三大制度工具,配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治理,构建起能统筹个体与公共、短期与长远利益的经济治理模式。其核心特征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主导的调控体系对资本增殖性的制度性约束与战略引导,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改变了资本的属性及其运动规律。这一制度设计既保持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性,又通过国家战略引导克服了资本积累的对抗性矛盾,但实践中仍面临央地博弈、发展错位等非对抗性治理难题。本文将此运行模式进行学理化阐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循环提供了更贴合国情的系统分析框架,弥补了国民经济循环已有研究的空白。利用此框架,本文对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三个阶段:“招商引资+土地财政”时期、“基建扩张+土地金融”时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期进行了深入剖析,清晰地揭示了不同阶段中国经济循环的特点、存在的问题以及“内需不足”的理论逻辑(地方政府行为偏差导致“次级循环”依赖与“第三级循环”投入不足)与制度根源(土地制度引致租金过度提取、财税与考核机制催生基建投资偏好,共同抑制生产劳动价值创造与民生创新投入),为理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提供了新视角。

最后,本文提出了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双重转型”思路:加大“第三级循环”投入,协调推进财税、土地、户籍与绩效考核制度改革,转变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在激活“第三级循环”的同时适当保留地方政府在“次级循环”中的能动作用。具体建议包括增加地方政府可持续增收来源、降低对土地的依赖;增加对属地以保障性住房为代表的公共服务以及科技创新的支持;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共同纳入绩效考核指标等。

参考文献

- 大卫·哈维. 2017. 资本的限度[M]. 张寅,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
(original language) HARVEY D. 1982. *The limits to capital*[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大卫·哈维. 2024.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新解[M]. 张义修,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 444, 448.
(original language) HARVEY D. 2023. *A Companion to Marx's grundrisse* [M]. London: Verso.
- 戴维·哈维. 2019. 新帝国主义[M]. 付克新,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original language) HARVEY D. 2004. *The new imperialism*[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郭克莎. 2024. 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层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 (6): 4-11.
- GUO K S. 2024. Coordinating the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and the deepening of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The underlying logic[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 4-11. (in Chinese)
- 韩雷, 彭思倩, 何召鹏. 2022. 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基于马克思主义资本三级循环理论[J]. 经济纵横, (6): 21-29.
- HAN L, PENG S Q, HE Z P. 2022. Smooth the domestic cycle: Internal logic and realization path—Based on marxist theory of three-stage capital circulation [J].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6): 21-29. (in Chinese)
- 韩喜平, 马丽娟. 2024. 马克思经济循环理论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5): 101-110, 203-204.
- HAN X P, MA L J. 2024. Marx's economic cycle theory: Forging a new development dynamic[J]. *Marxism & Reality*, (5): 101-110, 203-204. (in Chinese)
- 何召鹏. 2022. “国民共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 政治经济学评论, 13(2): 148-163.
- HE Z P. 2022. The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the State advances as the private sector advances”[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3(2): 148-163. (in Chinese)
- 何召鹏. 2025. 价值理论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分析[J]. 政治经济学评论, 16(2): 211-224.
- HE Z P. 2025. Spatial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of value theory[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6(2): 211-224. (in Chinese)
- 何召鹏, 肖畅. 2025. 中国特色基础设施建设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理论逻辑与转型发展[J]. 教学与研究, (5): 102-114.
- HE Z P, XIAO C. 2025. Political-economic analysi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etical logic and transformation pathways[J]. *Teaching and Research*, (5): 102-114. (in Chinese)
- 江小涓, 孟丽君. 2021.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J]. 管理世界, 37(1): 1-18.
- JIANG X J, MENG L J. 2021. Mainly inner circulation, outer circulation empowerment and higher level double circulation: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Chinese practi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7(1): 1-18. (in Chinese)

- 蒋震. 2014. 工业化水平、地方政府努力与土地财政：对中国土地财政的一个分析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10): 33-45.
- JIANG Z. 2014. Industrialization, local government efforts and land finance: A perspective of land finance in China[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10): 33-45. (in Chinese)
- 李建伟. 2018. 中国经济增长四十年回顾与展望[J]. 管理世界, 34(10): 11-23.
- LI J W. 2018.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of China's forty years of economic growt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4(10): 11-23. (in Chinese)
- 李克强. 2011. 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 逐步完善住房政策和供应体系[J]. 求是, (8): 3-8.
- 李自若, 杨汝岱, 黄桂田. 2022. 内贸成本、外贸成本与畅通国内大循环[J]. 中国工业经济, (2): 61-79.
- LI Z R, YANG R D, HUANG G T. 2022. Intra-national trade costs, international trade costs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domestic circulation of China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 61-79. (in Chinese)
- 林岗. 1987. 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兼析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结构和[J]. 哲学研究, (4): 28-38.
- LIN G. 1987. On the principle of “productive forces determin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With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e of public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J]. *Philosophical Research*, (4): 28-38. (in Chinese)
- 刘海建, 胡化广. 2023.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与劳动力就业——基于流通标准一体化视角的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40(10): 51-70.
- LIU H J, HU H G. 2023. Smooth national economic cycle and employment of labor: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of circulation standards[J]. *The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 Technical Economics*, 40(10): 51-70. (in Chinese)
- 马克思, 恩格斯. 197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册)[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马克思, 恩格斯. 202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孟捷, 吴丰华. 2020. 制度-垄断地租与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一个马克思主义分析框架[J]. 开放时代, (2): 160-179.
- MENG J, WU F H. 2020. The institution-monopoly rent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in China: A marxist framework of analysis[J]. *Open Times*, (2): 160-179. (in Chinese)

- 田野,倪红福,夏杰长. 2024. 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产业结构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J]. 世界经济, 47(2): 3-31.
- TIAN Y, NI H F, XIA J C. 2024.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ycles,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hanges in the aggregate share of Labour Income[J]. *The Journal of World Economy*, 47(2): 3-31. (in Chinese)
- 王晋斌,厉妍彤. 2021.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理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政治经济学[J]. 政治经济学评论, 12(1): 203-219.
- WANG J B, LI Y T. 2021. On the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2(1): 203-219. (in Chinese)
- 王媛. 2013. 我国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的战略转变——基于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 经济学家, (11): 76-85.
- WANG Y. 2013.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of managing a city for local government—Empirical evidence based on city panel data[J]. *Economist*, (11): 76-85. (in Chinese)
- 王智强,程恩富. 2024. 开放经济社会再生产视角下经济循环与经济增长研究[J]. 经济研究, 59(7): 188-208.
- WANG Z Q, CHENG E F. 2024. A study on economic circ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production in an open econom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9(7): 188-208. (in Chinese)
- 温兴祥. 2025. 城市保障性住房获取对农业转移人口家庭消费的影响[J]. 中国农村观察, (2): 50-68.
- WEN X X. 2025. The effect of access to urban affordable housing on household consumption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J]. *China Rural Survey*, (2): 50-68. (in Chinese)
- 郝戈. 2023. “驾驭资本”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12): 4-18, 199.
- XI G. 2023.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Harnessing capital”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2): 4-18, 199. (in Chinese)
- 习近平. 2025. 习近平经济文选(第1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 谢富胜,高岭,谢佩瑜. 2019. 全球生产网络视角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和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 35(11): 89-101, 118.
- XIE F S, GAO L, XIE P Y. 2019. The supply-side structural reform in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 economy and evide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5(11): 89-101, 118. (in Chinese)
- 谢富胜, 匡晓璐. 2022. 以问题为导向构建新发展格局[J]. *中国社会科学*, (6): 161-180, 208.
- XIE F S, KUANG X L. 2022.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with a problem-oriented approach[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6): 161-180, 208. (in Chinese)
- 徐志向, 丁任重, 张敏. 2021. 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视阈下中国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研究[J]. *政治经济学评论*, 12(5): 40-63.
- XU Z X, DING R Z, ZHANG M. 2021. Research on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of China's economic "Dual Circu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J]. *China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12(5): 40-63. (in Chinese)
- 杨雪锋, 史晋川. 2010. 地根经济视角下土地政策反周期调节的机理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6): 5-11.
- YANG X F, SHI J C. 2010. Analysis of functioning mechanism of land policy and macroeconomic adjustment from the theory of land-regulated economy[J]. *Economic Theory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6): 5-11. (in Chinese)
- 余泳泽, 胡山, 杨飞. 2022. 国内大循环的障碍: 区域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J]. *中国工业经济*, (12): 108-126.
- YU Y Z, HU S, YANG F. 2022. The barrier to domestic economic cycle: Efficiency loss of regional market segmentation [J].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12): 108-126. (in Chinese)
- 张平, 刘霞辉. 2011. 城市化、财政扩张与经济增长[J]. *经济研究*, (11): 4-20.
- ZHANG P, LIU X H. 2011. Urbanization, fiscal expans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11): 4-20. (in Chinese)
- 张宇. 2016. 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J]. *经济研究*, 51(6): 4-16.
- ZHANG Y. 2016. On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and market economy[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51(6): 4-16. (in Chinese)
- 赵景龙. 2025. 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内涵特征、约束条件与突破路径[J]. *当代经济研究*, (4): 27-42.
- ZHAO J L. 2025.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low-altitude economy: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constraints and breakthrough paths [J]. *Contemporary Economic Research*, (4): 27-42. (in Chinese)
-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课题组. 2024. 我国消费领域面临的障碍与应对[J]. *全球*

化, (2): 19-28.

Research Group of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2024. Obstacles and responses faced by China's consumption sector[J]. *Globalization*, (2): 19-28. (in Chinese)

周世愚. 2021. 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理论分析与经验事实[J]. 管理世界, 37(10): 128-137.

ZHOU S Y. 2021. Local government debt risk: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facts[J].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7(10): 128-137. (in Chinese)

HARVEY D. 1978. The urban process under capitalism: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1/3): 101-131.

The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Explanation of the “Three-circuit”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 National Economy

HE Zhaopeng YUAN Hanzheng XIAO Chang

(School of Economics,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ijing,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China's impeded economic circulation, characterized by insufficient domestic demand,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critically draws on Marxist theory of “Three-circuit” of capital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contemporary China's economic circulation: the “Three-circui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economy with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The core characteristic lies in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and strategic guidance imposed by the socialist public ownership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on the profitability-seeking nature of capital, with the entire national economic circulation serving the purposes of socialist production. Utilizing this framework to analyze China's economic practice across three phases since the tax-sharing system reform, this paper reveals that excessive reliance on the “secondary circulation” and neglect of the “tertiary circulation” are underlying causes of insufficient domestic demand. Consequent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a reform strategy of “du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one hand, increase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represented by affordable housing to change the mod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the other hand, coordinate and advance related institutional reforms, transform the incentive and constraint mechanisms of local government behavior, while appropriately retaining the proactiv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conducting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buffering economic fluctuations

Keywords: insufficient domestic demand; the theory of “Three-circuit” of capital; the theory of the “Three-circuit”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economy with 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Dual transformation”